



1912

民国史学述论稿

(1912-1949)

谢保成 著

Minguo Shixue Shulungao

谢保成 著

民国史学述论稿

(1912-1949)

Minguo Shixue Shulungao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民国史学述论稿:1912~1949/谢保成著.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ISBN 978-7-208-10073-2

I. ①民… II. ①谢… III. ①史学—研究—中国—
1912~1949 IV. ①K260.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130299号

责任编辑 张美娣

封面装帧 王小阳

民国史学述论稿(1912—1949)

谢保成 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5 插页 2 字数 350,000

2011年10月第1版 2011年10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208-10073-2/K·1784

定价 40.00元

叙 论

世纪之交以来,以 20 世纪史学为题的著论内容多为 20 世纪前半纪,大多分门别类,或侧重思潮、派别,或偏重人物、名著,或为专题研究、趋势分析等,尚未形成综合著述。本书试就尘封的史学书刊和纷争的史学问题进行一次清理和条贯,以期对民国年间(1912—1949)史学作一综合述论,如实反映这一时段史学的基本面貌。

一、史学发展线索

20 世纪前半纪的史学发展,基本走势是由古及近、由内向外,以如何认识历代史学为发端,逐渐迈向如何认识中国历史。先是如何认识中国传统史学与古代社会,进而为如何认识新史学与近代社会,再进一步则开始认识中国与世界。

世纪初兴起的“新史学”,呼唤“史界革命”,主要围绕如何认识中国史学提出,一方面揭露传统史学的“弊”、“病”,一方面对史学重新定义,包括史学对象与任务、自身特质、价值与功用、与相关学科关系等基本内容,初步确立起新史学体系,涉及历史进化、地理环境、英雄与时势、英雄与群众、历史研究法以及编写民史、编写新史等诸多方面。

与此同步,一股强劲的新潮涌入中华大地,对认识中国历史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这就是近代考古学的传入与本土文化遗存的被发见。

英、法、德、日、俄在中国新疆、甘肃的挖宝式“考古”,使得古“丝绸之路”沿线的历史文化遗存,特别是敦煌文化艺术品遭到一次劫掠,迫使中国学者开始接受西方近代考古学思想,把考古学作为“新

史学”必不可少的内容。梁启超《中国史叙论》有“史以前之时代”一节，介绍欧洲考古学，以“旧新两石刀期”、“铜器时代”为“史前三期”，来对照中国的史前社会。1907年《国粹学报》第2号刊出刘师培《中国古用石器考》，从历史进化角度介绍欧洲考古学成就，引证《尚书》、《礼记》、《越绝书》、《述异记》、《说文解字》等，论说中国古代曾经经历过石器时代、铜器时代。

至20年代末，史前遗址的主要发见有直立人化石、旧石器时代遗址、新石器时代遗址。旧石器时代文化为周口店中国猿人文化、永定河与水洞沟河套文化、海拉尔达赖文化，新石器时代文化为昂昂溪文化、仰韶文化、龙山文化。30年代，旧石器时代文化又发见周口店山顶洞人文化。裴文中以仰韶彩陶文化、河套旧石器文化、中国猿人以及山顶洞人的发见为“四个大发见”：

有了以上四个发见，中国史前人类之历史，已大体可以完成——即由旧石器时代初期起，至新石器时代末期止，我们可以划分为四个大时期，每时期皆有代表者；中间虽有一部分尚未能联结，但中国史前学的基础算是已经奠定了。

同时指明，“研究中国上古史者，亦可追溯上古文化之来源”。〔1〕

史前遗址之外的新发见，则如王国维所说：

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见。……今之殷虚甲骨文字，敦煌塞上及西域各处之汉晋木简，敦煌千佛洞之六朝及唐人写本书卷，内阁大库之元明以来书籍档册。……故今日之时代可谓之发见时代，自来未有能比者也。〔2〕

〔1〕 裴文中：《中国史前时期之研究》，商务印书馆1948年，第4、6页。

〔2〕 王国维：《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见之学问》，《学衡》第45期（1925年9月）。

甲骨卜辞、汉晋简牍、敦煌文物、明清档案,再加“中国境内外之古外族遗文”(突厥、回鹘、梵文、西夏文等),此五项发见成为推动 20 世纪中国史学发展不可或缺的前提和基础,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决定着中国史研究的路向。

王国维“不以学术为手段,而视学术为目的”,所作甲骨文字、殷周金文、汉晋简牍研究的“划时代的工作”,关于西北地理、蒙古史研究的“惊人的成绩”,深受信仰完全不同的学界代表人物的极高推崇。陈寅恪谓之“皆足以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以《王国维遗书》“为吾国近代学术界最重要之产物”,“别有超越时间地域之理性存焉”〔1〕。郭沫若将王国维与鲁迅相提并论,王国维为“新史学的开山”、鲁迅为“新文学的开山”,以《王国维遗书全集》和《鲁迅全集》为“‘虽与日月争光可也’的一对现代文化史上的金字塔”〔2〕。

与此同时,孔德、理凯尔特、柏格森、杜里舒、杜威、朗普勒西特、鲁滨逊等的思想观点被引进,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思想学说开始传播。这些引进和传入的思想观念,对于国人学术思想都程度不同地产生过一定的影响。整个 20 年代,差不多年年都有这方面的译著和论著推出〔3〕。对此,何炳松有过一段形象的概括:

对于西洋史学原理的接受,正与一般政治学家、经济学家、新文学家同,一时顿呈饥不择食、活剥生吞之现象。〔4〕

这种取其皮毛的生搬硬套,由于缺乏融会贯通,使人颇有“学说纷纭,

〔1〕 陈寅恪:《王静安先生遗书序》,《王静安先生遗书》第 1 册,商务印书馆 1940 年,序一。

〔2〕 郭沫若:《鲁迅与王国维》,《历史人物》,新文艺出版社 1952 年,第 293—294、300 页。

〔3〕 参见《八十年来史学书目》,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4 年。

〔4〕 何炳松:《通史新义·序》,《通史新义》,商务印书馆 1930 年,第 13 页。

莫衷一是”之感。在“生吞活剥”的盲目过后，留下了作为时代标志的论著——李守常《史学要论》，何炳松《通史新义》、《历史研究法》，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及《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等。

新思想、新史料的大量涌现，引起了旧思想、旧史学的激烈反对，出现了“国粹”、“国学”与“国故”之争。辛亥革命前，“国粹”和“国学”两个从日本舶来的词汇并行，反映社会变革当中学术与政治的某种复杂关系：“用国粹激动种性”，称“国学”进行学术研究。民国年间，“国故”与“国学”两种说法并行，出现“赛先生之‘国学’”、“冬烘先生之‘国学’”和“神怪先生之‘国学’”，造成“人莫解国学之实质，而皆以国学鸣其高，势之所趋”的“致命伤”〔1〕。然而，不论章太炎提倡的“国粹”，还是胡适主张的“整理国故”，也不论是“爱惜汉种的历史”，抑或“用历史的眼光来扩大国学研究的范围”，所谓“国粹”、“国故”都与历史、历史学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

新观念与新材料一经结合，便遇到如何认识中国历史源头的问题。先是对已有历史文献表现为“疑古”态度，出现“古史辨”，胡适、顾颉刚、钱玄同、丁文江、柳诒徵、魏建功、容庚、王国维、傅斯年、张荫麟、马衡、缪凤林、姚名达、周予同、梅思平、冯友兰、郭绍虞、王伯祥、陆懋德、曹养吾、钱穆、李镜池、容肇祖、郑振铎、俞平伯、周作人、刘大白、董作宾、钟敬文、朱自清、罗根泽、梁启超、刘盼遂、游国恩、余嘉锡、张西堂、张尔田、朱希祖、唐兰、高亨、马叙伦、蔡元培、刘汝霖、吕思勉、刘节、范文澜、童书业、谭戒甫、金德建、方国瑜、郭沫若、杨宽、杨向奎、翁独健、蒙文通、齐思和、陈梦家、吴其昌等一大批名家参与讨论，成为 20 世纪影响广泛、久远的一场学术论辩。继而以新发现的地下遗存考证中国古史，使古史得以新证。王国华总结王国维的“治学之方”，谓“其疑古也，不仅抉其理

〔1〕 曹聚仁：《春雷初动中之国故学》，《国故学讨论集》第 1 集，群学社 1927 年，第 84—85、88 页。

之所难符,而必寻其伪之所自出。其创新也,不仅罗其证之所应有,而必通其类例之所在”〔1〕。胡适认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是顾颉刚“讨论古史的根本见解,也就是他的根本方法”,“要研究那一层一层的皮是怎样堆砌起来的”〔2〕。陈寅恪发现《蒙古源流》是在《蒙古秘史》“所追加之史层上,更增建天竺吐蕃二重新建筑”,是“糅合数民族之神话,以为一民族之历史”,强调“吾人今日治史者之职责,在逐层剥除此种后加之虚伪材料”〔3〕。历史考据从理论到方法得到一次提升,成为辨识后人“层累”古史或“逐层向上增建”古史的一种观念和方法。

新旧体史书编著并驾齐驱,反映直至20年代末史学依然新旧杂陈的实际。旧体史书编纂,主要是延续纪传系列、典志系列,有列入“正史”的《新元史》、接续二十四史的《清史稿》以及新修蒙元史《蒙兀儿史记》和列入“十通”的《清朝续文献通考》,这都是迄今研究蒙元史、清史的基本史籍。吕思勉《白话本国史》、王桐龄《中国史》、萧一山《清代通史》、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柳诒徵《中国文化史》、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分别为新体通史、断代史、专门史的代表,预示着史书编著的某种新趋势。

1927年、1929年,王国维、梁启超先后谢世,标志着20世纪初兴起的“新史学”告一段落。二人所代表的“新史学”两大基本路向,以更新的方式取得长足发展,深深地影响着其后的史学。

王国维侧重史学与史料的关系,以史料新发见带动史学发展。梁启超侧重史学与社会的关系,以社会新需求推动史学发展。史料新发见与社会新需求,都是史学发展不可或缺的基本要素。由于每位学人有各自不同的社会经历、学术渊源、思维方式,因而形

〔1〕《王静安先生遗书序》,《王静安先生遗书》第1册,序三。

〔2〕《古史讨论的读后感》,《古史辨》第1册,北京朴社1926年,第192页。

〔3〕《彰所知论与蒙古源流》(《蒙古源流研究之三》),《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2本第3分(1931年)。

成不同的研究路向和研究特点,不应厚此非彼或厚彼非此,而应当“见其异同”,既要指出其观念、方法、取材等的差异,更应见其相互吸收、彼此趋同。任何学术研究,都是在彼此吸收、取长补短的过程中逐渐得到发展的。因种种原因只见其“异”而忽视其“同”及相互间的交流与吸收,必然造成偏颇,不利于学术发展,甚或造成对于学术发展的危害。

王国维去世一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创立;梁启超去世一年,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开辟草径”之作——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出版,非常巧合地成为中国史学出现重大转折的标志。自此而后,形成民国年间史学的两大主干:以保存史料、研究史料为宗旨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团队,以唯物史观指导研究中国历史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群体。

王国维所代表的路向,以史学与新史料相结合,从世纪初的盗掘和零星研究发展为 30 年代的科学发掘、整理与系统研究,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学术研究集中体现了这一路向的实际,推动着中国史的基础研究向纵深发展。面对西洋史学原理“或偏而不全,或似而非是,几无一足当义例”以及中国境内语言学和历史学的材料“毁坏亡失”的实际,为避免“乌烟瘴气”充斥而遭“妄自生事之讥诮”,历史语言研究所在“中央研究院设置之意义,本为发达近代科学”的总原则之下,利用自然科学提供的工具“整理一切可逢着的史料”,把“材料与时增加,工具与时扩充,观点与时推进”作为“此虽旧域,其命维新”的旨趣。在“歧路旁皇,莫知所止”的情况下,“不以空论为学问,乃纯就史料以探史实”,保存下一块避免“乌烟瘴气”的学术“净土”,经过 20 年的努力,使得有关新石器时代、甲骨学、简牍学、敦煌学、西夏学、清史的众多史料不再“坐失毁灭”,取得诸多重大学术成果,证明“科学的东方学”之仰韶文化、甲骨学之“正统”已在中国,敦煌学之“正统”正在回归中国。“以甲骨文金文为研究上古史的对象;以敦煌材料及其他中央亚细亚近年出现之材料,为研究中古史的对象;以明清档案为

研究近代史的对象”〔1〕这一以材料定研究的原则,迄今仍然为研究中国史的学人们遵循着。

梁启超所代表的路向,以史学与现实紧密结合,从世纪初的史界革命进而为 30 年代的社会革命,社会史论战体现着这一路向的实际,推动着中国史学观念的转变、部分分支学科的形成。社会史论战对史学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大基本方面,一是唯物史观被广泛接受,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经济史的研究,形成两支骨干力量:以陶希圣和围绕《食货》的学人为“一支重要力量”,研究成果有多种经济通史和近代经济史,断代经济史有西汉、三国、南北朝、唐代、宋元等,专题经济史包括土地制度、田赋、农业经济、民食、粮政、救荒、蚕业、渔业、水利、新工业、矿业、商业、交通、财政、货币、盐政、盐业等;另一支力量以汤象龙、梁方仲、谷霁光等为代表,成为新中国从事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骨干。二是经过社会史论战,在“草径”已经开辟后的 10 年间,郭沫若、吕振羽、翦伯赞、侯外庐、范文澜等,运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古代的社会、政治、思想,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建筑”通往未来的“铁路”铺下坚实的路基,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骨干队伍形成。

由于论战者党派不同、意识形态不同、认识不同,引用理论依据、引用国外论著不同,必然造成国外有什么时髦的“名词,中国便就有”的盲目性,这几乎成为 20 世纪中国思想文化领域带“普遍性”的一种弊病,最值得跟风者和谈思潮者深思。同时,暴露出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骨干队伍的重大缺失:一是对社会经济的关注基本集中在对生产方式的研究上,而对现代经济、古代经济则很少问津,社会史论战在他们的研究成果里差不多成了社会发展史或社会发展形态的论战,马克思主义历史学骨干队伍在中国经济史研究领域出现空缺;二

〔1〕《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十七年度报告》,《傅斯年全集》第 6 卷,湖南教育出版社 2003 年,第 17 页。

是以摩尔根、恩格斯为“向导”的关于文明起源的研究，继郭沫若之后，仅侯外庐《中国古典社会史论》从理论与史实结合上探讨过“中国进入文明社会的方式”，随后这一问题即被长期搁置。仅此两大缺失，就直接影响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科学体系的建立，严重影响20世纪后半纪中国主流史学的深入发展。

与两大史学主干同时并存，偏重史学与史料关系者，陈寅恪之外，顾颉刚、陈垣为代表人物。他们在古史、古代文献、历史地理、民俗学、宗教史、校勘学、年历学、避讳学、史源学、目录学、多种语言文字翻译与研究、唐史、敦煌学、西夏研究、蒙元史、佛教史方面的探索，以诗证史和以治史方法研治诗词，最大限度地“扩张研究材料”、“扩张研究范围”，极大地丰富了历史学学科领域。而且成就卓著，影响久远，在海内外享有极高的声誉，被视为是“现在中国学者中，尤为有价值之学者”。偏重历史哲学者，以“文化”或“生命”观念发挥其主体意识，“创造过去”、服务现实，朱谦之、常乃德、林同济与雷海宗为其代表，基本特点是既反对历史语言研究所旨趣，又反对以唯物史观指导研究历史，试图“另谋开辟一条新途径”。

1930—1949年的20年间，史书撰著层出，既有作为某“潮”某“派”的代表作，更有不属于某“潮”某“派”的众多撰著。通史撰述，以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钱穆《国史大纲》为两大代表。断代史研究，形成各具影响的代表人物。先秦史，有蒙文通《古史甄微》、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童书业《春秋史》等。秦汉史，劳榦、杨树达、孙毓堂等为代表。魏晋南北朝史，陈寅恪、周一良影响最著。隋唐五代史，陈寅恪、岑仲勉成就与贡献尤为突出。宋史，邓广铭有“筚路蓝缕之功”，张孟伦、张家驹、陈乐素各展所长。陈述的辽、金史，冯家昇、陈汉章的辽史，王静如的西夏研究，王国维、陈垣、陈寅恪的蒙元史，均有重要影响。吴晗以朱元璋研究奠定在明史领域的学术地位，王崇武、李晋华关于《明史》的研究，谢国桢《晚明史籍考》、《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均为无可企及的成果。清史研究，继萧一山之后，孟森

贡献最大,为民国年间清史学的“里程碑”式人物。近代史研究,出现两家代表作,蒋廷黻《中国近代史》以“近代化”观念贯穿全书,范文澜《中国近代史》(上编第一分册)以唯物史观贯穿全书。近百年政治史研究、太平天国研究均已形成名家,尤以罗尔纲的太平天国史研究最受中外学界推崇。专门史著述门类繁多,包括政治、经济、思想、社会、民族、中外关系等方方面面,被纳入广义的“文化史”,商务印书馆自1936年开始印行《中国文化史丛书》。虽然多属拓荒之作,但在开拓视野、扩展研究方法等方面产生出一定的影响。

在中外文化的不断碰撞下,国人视野逐渐从周边、中亚、东南亚、西亚、东非拓展到整个世界。中外关系史、世界史研究的兴起,从一个侧面反映国人认识世界所迈出的步履。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冯承钧《中国南洋交通史》,是中外关系史领域无可替代的撰著。国人编写世界史,以1908年晏彪、廖宇春《世界历史》为最早,但以西洋史数量为多。国人所写世界断代史、近代史、各洲史、各国史以及专门史、国际关系史,数量不等,以东洋史、东亚史数量为多。国际关系方面,以近代欧洲外交关系史数量为多。周谷城三卷本《世界通史》,为20世纪前半纪世界通史的一项带总结性的成果。

史学史学科,古代史学以金毓黻《中国史学史》为代表,近百年史学以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为代表。历史文献整理,三大丛书系列——《四部丛刊》、《四部备要》、《丛书集成》提供了诸多足以补《四库全书》之阙、纠《四库全书》之谬的更好版本。历史文献工具书编纂,以洪煊莲和哈佛燕京学社所编引得成绩最为卓著。

20世纪前半纪的史学是在新史料、新方法、新观念、新理论以及国外某些导向等诸多因素综合推动下全面发展起来并取得巨大成就的,绝非某单一因素或某几种因素所能促成。

二、“最纠纷”之古史

古史问题是研究中国历史“最纠纷之问题”,古老而常新,既是史

料问题、方法问题,又是认识问题、观念问题,还包含理论问题。

不同时代有不同的历史观念,不同时代对于历史的认识不完全相同。由于历史观念的差异,记述历史的载体必然带上各个时代的不同色彩。文字出现以前,对于往事只能通过口耳相传的形式流传。数千年无文字的往事,留下来的只是很少的一部分。而这一小部分,每经过一次口耳相传,便有意无意地掺进一次转述者所在时代的观念。

春秋战国时期,诸子为了宣扬各自的政治主张和伦理观念,往往从神话传说中选取各自需要的内容,或以寓言寄托其思想,或以古事寄托其理想。神话传说在这种流传过程中被传颂者、各家各派不断改造,以致失去本来面目。而中国最早的一批历史文献,都是经春秋战国至汉初最后写定的,不知掺入了多少转述者、传写者的主观意识。所以,孔孟时代就有“尽信书不如无书”的感叹。

战国纷争数百年,北方民族不断融合,需要树立一个在血缘上有连带关系的共同先祖。《礼记·祭法》规定:“有虞氏禘黄帝而郊尧,祖颛顼而宗尧;夏后氏亦禘黄帝而郊鲧,祖颛顼而宗禹;殷人禘喾而郊冥,祖契而宗汤;周人禘喾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就是说,祭拜祖先,夏要祭拜黄帝和黄帝的曾孙鲧以及鲧的儿子禹,殷要祭拜黄帝的曾孙喾和喾的儿子契以及契的后代成汤,周要祭拜黄帝的曾孙喾和喾的儿子后稷以及稷的后代文王和武王。一项祭拜规定就把夏、商、周三代的祖先都划定为黄帝和黄帝之后,甚至连“秦之先”也成了“帝颛顼之苗裔”,全社会一下子都变成了以黄帝为共同祖先的血缘亲戚。不仅于此,黄帝还被当作“人神”(天子和诸侯共同崇拜的祖先神)来崇拜,各种被神化了的社会力量便统统加载到黄帝名下。《易·系辞下》把黄帝、尧、舜神化为人类生活万物的发明者:剡木为舟、剡木为楫、服牛乘马、断木为杵、掘地为臼,以利天下;弦木为弧、剡木为矢,以威天下,因此“垂衣裳而天下治”。《管子》更赋予黄帝用火的发明权,赋予黄帝王者的权威。其《轻重戊》篇以“黄帝作,钻燧

生火，以熟荤臊，民食之无兹胃之病，而天下化之”，《五行》篇称“黄帝得蚩尤而明于天道，得大常而察于地利，得奢龙而辩于东方，得祝融而辩于南方，得大封而辩于西方，得后土而辩于北方。黄帝得六相而天地治，神明至”。

从秦“焚书坑儒”到汉初“独尊儒术”，被奉为儒家经典的《易》、《诗》、《尚书》、《礼》、《春秋》都存在着不同的承传系统。《尚书》有今文、古文之争，《礼》有大戴（戴德）、小戴（戴圣）之别，《春秋》分左氏、公羊、穀梁三传，等等。《尚书》有禹而无黄帝，《古文尚书序》也没有黄帝，却以少昊、颛顼、啻、尧、舜为“五帝”。《易·系辞下》以庖牺、神农、黄帝、尧、舜为“五帝”，《大戴礼记》以黄帝、颛顼、帝啻、帝尧、帝舜为“五帝”。造成这种有别的根本原因，就在于转述者、传写者都是根据各自的理解或需要在进行转述、传写。

魏晋时期发见汲冢书，被称为《竹书纪年》。当竹书不复存在之后便又有了古本、今本之别：古本起自夏，今本起自黄帝。汉魏以来，古史再次被上推，出现了“盘古开天地”。

自唐至清，对于古史形成这样一种趋势：就观念、认识而言，存在疑古、惑经的情况。就修史而言，重史实者多以东周或春秋战国为起始，司马光《资治通鉴》为代表；偏重义理者不断上溯，出现“起帝尧元载”的《通鉴前编》、“起伏羲”的《通鉴外纪》、“始于盘古”的《皇王大纪》等。就方法而言，考异、辨伪是比对文献、发现问题的基本方法。

当人们以新的观念对古史进行再探讨时，顾颉刚提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认识和“打破民族出于一元”、“打破地域向来自一统”、“打破古史人化”、“打破古代为黄金世界”的观念。其间，鲁迅、王国维、陈寅恪的相关论述最值得注意。

1924年7月，鲁迅讲《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有一则论述：

从神话演进，故事渐进于人性，出现的大抵是“半神”，如说古来建大功的英雄，其才能在凡人以上，由于天授的就是。例如

简狄吞燕卵而生商，尧时“十日并出”，尧使羿射之的话，都是和凡人不同的。这些口传，今人谓之“传说”。由此再演进，则正事归为史，逸史即变为小说了。^{〔1〕}

神话传说演变为论说古事，是中国古代神话传说政治化、历史化的主要形式，也是中国古代神话传说最突出的特点。“正事归为史”，就是“古来建大功的英雄”被人为地政治化，“归为”中国古史的主体。没有被“归为史”的便不成其为历史，只能算作“逸史”或小说家言。这一论述，道出了中国神话传说与历史记载的关系，以及历史记载是如何被当成历史事实的。

1925年2—8月，王国维讲《古史新证》，指出“研究中国古史为最纠纷之问题”：

上古之事，传说与史实混而不分：史实之中固不免有所缘饰，与传说无异，而传说之中亦往往有史实为之素地，二者不易区别。

这一对上古史的认识，指出其既有传说成分，更有“与传说无异”的“有所缘饰”成分，也有史实成分。古史新证，就是要将“传说与史实混而不分，史实之中固不免有所缘饰”者区分开来，剔除“有所缘饰”，肯定“得证明者”。弄清传说与史实，弄清“缘饰”与史实，首先面对的是现存各种史料，考辨史料真伪便成为研究上古之事的先决条件。

1929年冬，陈寅恪在故宫博物院发现《蒙古源流》蒙文本刊本、写本及满文译本，与天津阁本、坊间汉译刊本以及施密德校译本等互校，一连写出4篇“蒙古源流研究”，与顾颉刚“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

〔1〕《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鲁迅全集》第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312页。

史”相呼应，不仅论证北边蒙古族的古史也是在“逐层向上增建”的，而且指出这是一个带普遍性的问题：

夫逐层向上增建之历史，其例自不限于蒙古史。其他民族相传之上古史，何独不然。……蒙古民族实从此传授一历史之新观念及方法。蒙古源流即依据此观念，以此方法，采集材料，而成书者。〔1〕

鲁迅、王国维、陈寅恪的论述表明，古史中存在着传说、史实以及后人的不断追加，要加以区分就必须从观念、认识、史料、方法等诸多方面进行综合考察。

随着全球人类学、考古学、民族学等学科的发展，古史逐渐成为历史研究中最受关注的一个领域，不但成为历史理论问题，而且成为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重要内容。

19 世纪 60 年代以来的数十年间，欧美学者围绕人类原始历史和文明起源出现研讨热。1861 年瑞士历史学家、法学家约·雅·巴霍芬《母权论。根据古代世界的宗教和法权本质对古代世界的妇女统治的研究》一书论证“由‘杂婚’到一夫一妻制的发展，以及由母权制到父权制的发展”，1865 年苏格兰历史学家约·弗·麦克伦南《原始婚姻。关于婚礼中抢劫仪式的起源的研究》、英国民族志学进化论学派创始人爱·伯·泰罗《人类原始历史和文明的产生的研究》问世。美国民族志学家、历史学家路·亨·摩尔根 1871 年《人类家庭的血亲和姻亲制度》、1877 年《古代社会，或人类从蒙昧时代经过野蛮时代到文明时代的发展过程的研究》发现“原始的母权制氏族是一切文明民族的父权制氏族以前的阶段”，“为全部原始历史找到了一

〔1〕《彰所知论与蒙古源流》（蒙古源流研究之三），《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 2 本第 3 分（1931 年）。

个新的基础”，预示着“开辟了一条新的研究途径及进一步窥探人类史前史的可能”。

上述研究，引起经典作家极大的关注。马克思 1881 年 5 月至 1882 年 6 月研读摩尔根《古代社会》、爱·伯·泰罗《人类原始历史和文明的产生的研究》，1882 年 10—11 月阅读英国学者约翰·拉伯克《文明的起源和人的原始状态。蒙昧民族精神状态和社会状态》，均作有详细摘要和批语。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发现这些读书摘要，并“执行”马克思“遗言”，于 1884 年 6 月写成《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副题为“就路易斯·亨·摩尔根的研究成果而作”，序言明确指出：

摩尔根在美国，以他自己的方式，重新发现了四十年前马克思所发现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并且以此为指导，在把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加以对比的时候，在主要点上得出了与马克思相同的结果。〔1〕

1891 年 6 月恩格斯写成《关于原始家庭的历史（巴霍芬、麦克伦南、摩尔根）》一文发表，并作为序言编入当年年底出版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是为第四版序言，进一步强调：

确定原始的母权制氏族是一切文明民族的父权制氏族以前的阶段的这个重新发现，对于原始历史所具有的意义，正如达尔文的进化理论对于生物学和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对于政治经济学的意义一样。……在原始历史的研究方面开辟了一个新时代。……自从它被发现以后，人们才知道，应该朝着什么方向研究和研究什么，以及应该如何去整理所得的结果。〔2〕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第 1 页。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第 14 页。